

《資治通鑑》的敘事視角與儒家思想——以戰國史為例

一、前言

《資治通鑑》為北宋時期著名史學家司馬光所撰寫，其內容涵蓋許多面向，取材豐富、內容詳實，其中對戰國時期的記述尤為詳盡，戰國時代局勢錯綜複雜，諸子百家爭鳴，司馬光在書寫此段歷史時，展現出其獨特的敘事視角與價值判斷。

歷來學界對於司馬光評價商鞅變法的看法不一。如雷家宏在〈略談《資治通鑑》對變法革新的史事述評〉中提及司馬光對於提倡變法者持肯定態度，並用商鞅舉例說明。¹ 另一方面，李之勤在〈評《資治通鑑》關於商鞅變法的論述〉中卻有不同的想法，他認為司馬光對於商鞅變法的評價抱持負面的態度，並對史料內容進行刪改。² 再者，施寬文在《《資治通鑑》資鑑法戒的敘事藝術》中提到：

司馬光在《通鑑》中之敘史，文筆平易質直，是非褒貶明白，於敘事詳明之外，常對人君、史事之得失，持儒家之價值觀念，藉由「臣光曰」予以明確之評價。³

上文指出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時確有其價值觀判斷，對歷史及人物的褒貶是非皆有明確評價。由於目前學界對司馬光評價商鞅變法的看法兩極，並且相關研究較為缺少，故筆者欲以此觀點切入，探討司馬光對於商鞅變法的評價，及其評

¹ 雷家宏，〈略談《資治通鑑》對變法革新的史事述評〉，《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1989年4月），頁108。

² 李之勤，〈評《資治通鑑》關於商鞅變法的論述〉，《人文雜誌》1980年第1期（1980年1月），頁64。

³ 施寬文，《《資治通鑑》資鑑法戒的敘事藝術》（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年），頁68。

價背後的思想意涵，以補足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本文先梳理《資治通鑑》的特質及歷史定位，再從司馬光個人思想及政治理念、其對長平之戰事件敘述與看法、《資治通鑑》中對張儀的評價等三方面切入，探討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時，面對戰國時期的事件與人物，其敘事視角為何，以及其背後的書寫意涵。

二、司馬光的歷史工程：《資治通鑑》編纂動機與史學定位

與司馬遷所著《史記》相比，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乃宋神宗授權編撰，如《宋史》記載：

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詔光看詳《資治通鑑》，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⁴

在《宋史》中有明確記載宋神宗對司馬光的支持，司馬光作為北宋政壇的核心人物，其在保守派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政治理念與變法派存在顯著差異。如曹家齊的〈從推尊漢唐到超邁漢唐——司馬光的「三代」漢唐史論及其現實關照〉指出，司馬光崇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對北宋政局產生了深遠影響。⁵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光的保守派立場⁶ 某程度上影響了他對變法運動的評判，這也讓筆者在梳理

⁴ 〔元〕脫脫，《宋史》（台北：台灣商務，1981年），頁4161。

⁵ 曹家齊，〈從推尊漢唐到超邁漢唐——司馬光的「三代」漢唐史論及其現實關照〉，《新亞學報》2023年40卷第2期（2023年12月），頁60。

⁶ 李敏、張慧，〈北宋名臣司馬光的治國思想與《資治通鑑》〉，《蘭台世界》2013年第9期

《資治通鑑》的事件與人物時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考面向。

《資治通鑑》作為中國古代史學的重要里程碑，採編年體形式，記錄自戰國初期至五代末年長達 1300 多年的歷史。全書共 294 卷，300 餘萬字，⁷ 內容涵蓋政治制度、文化發展、經濟之外，⁸ 亦涉及文化思想的呈現、歷史事件的鋪陳與評述，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寫與判斷。在通覽這些史料的同時，筆者也能從中觀察司馬光在撰述過程中所可能展現的價值觀與敘事角度。這些敘事背後是否隱含作者自身的立場與時代觀，正是本文所欲進一步探討的重點。

三、儒法之辯：司馬光的思想傾向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戰國時期的儒法之爭展現出明顯的價值判斷，因此筆者透過商鞅變法此事件分析司馬光如何透過史料編纂傳遞心中思想。首先，司馬光在《資治通鑑》第二卷提及：「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⁹ 敘述商鞅變法時，以「徙木立信」的方式建立了法律的公信力，並在此事件敘述後寫下：「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¹⁰ 淺淺透露著司馬光對於儒家中「信」的重視，已深植於其治史與治國理念之中，相關論述吳秀琴在《司馬光史論研究》中提及司馬光對於信的重視，如：「勸諫人君應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才能使國家安如磐石，人民安康。」¹¹ 這進一步印證了司馬光將「信」視為君主須具備

（2013 年 3 月），頁 8。

⁷ 夏長樸，〈司馬光疑孟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 9 期（1997 年 6 月），頁 125。

⁸ 郭創任，〈《史記》與《資治通鑑》中的歷史敘事手法及其影響〉，《課外語文》2023 年第 7 期（2023 年 7 月），頁 35-36。

⁹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9。

¹⁰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12。

¹¹ 吳秀琴，《司馬光史論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73。

的特質之一。

其次，對於商鞅變法的用法嚴酷，司馬光也是持批判的態度，如其於《資治通鑑》評論：「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¹² 司馬光以「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當作比喻，藉此帶出其認為刑罰之重的思想，強調了商鞅施政的冷酷與苛刻。在司馬光筆下，商鞅的形象偏向於冷酷、嚴苛，與儒家所強調的「仁」德相距甚遠。

最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寫道：「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¹³ 其以「刻薄」來評價商鞅，指出即便在戰亂時代，其政治作風缺乏仁德，終致：「居五月而難作。」¹⁴ 的結局，認為其變法雖有成效，最終仍因手段嚴苛而遭遇困境，暗示著司馬光對商鞅變法這件事的批判與不認同，¹⁵ 從以上的事件反映出司馬光對其偏重嚴刑峻法、忽略道德教化之治國方式的批判與不贊同。

總結而言，司馬光在評價商鞅時，並非一味地否定。例如在「徙木立信」事件中，肯定其建立法律公信力的必要性，但隨後又透過「渭水盡赤」、「刻薄寡恩」等描述，逐步揭露商鞅治政的弊端。這種先肯定信、後批判嚴峻刻薄的價值判斷，正是司馬光以史明道、闡發儒家思想的具體展現，亦可看出司馬光對儒家價值的肯定與推崇。

¹²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9。

¹³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9。

¹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12。

¹⁵ 李樂，〈司馬光的編輯思想〉，《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2009年1月），頁138。

四、長平之戰：歷史記錄與道德警示的分歧

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時，不但承襲司馬遷的《史記》及班固的《漢書》，也參考引用如《河洛記》一類的雜史，並以「刪削冗長，舉撮機要」為原則，強調史事的資鑑功能。¹⁶ 以長平之戰為例，《資治通鑑》記載：「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¹⁷ 這段文字將秦國的反間計描述得極為簡潔，直接聚焦於趙王輕信讒言、將領更替的關鍵決策。然而在《史記》中的描述卻為：

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¹⁸

司馬遷不僅提及反間計，更交代趙王對廉頗軍事失利的不滿，以及多重考量下的決策過程。筆者認為從敘事策略來看，司馬光選擇簡化事件脈絡，將焦點放在君主失德、輕信讒言的道德警示上，凸顯其以史明道、資治法戒的寫作宗旨。這種處理方式，不僅強調「德治」與「明辨」的思想，也反映出司馬光在引用史料時的價值取向。

另外，司馬光在描述趙軍戰敗寫道：「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復，非盡殺之，恐為亂。」¹⁹ 筆者發現，在此處司馬光基本上照搬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述：「括軍敗，卒四

¹⁶ [清] 蔡世遠，《古文雅正 十四卷》，（台北：台灣商務，1983 年），頁 210。

¹⁷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82。

¹⁸ [漢] 司馬遷，《史記》，（台北：啟業書局，1977 年），頁 2334。

¹⁹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83。

十萬人降武安軍。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復，非盡殺之，恐為亂。」²⁰ 然而，在戰國時期，類似長平之戰這種國家間決戰的戰役並不罕見，例如秦國滅楚的鄢郢之戰，司馬光卻僅以寥寥數字輕描淡寫帶過，²¹ 只有兩三句說明白起向南攻取鄢、郢兩城，開疆括土。根據以上文字，司馬光對於長平之戰詳實的紀錄，不僅僅只是因為其歷史或軍事意義，更強調了戰爭的慘烈，特別是對坑殺降兵的殘酷描寫，藉此警醒世人。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引用《史記》記述長平之戰，但在反間計和將領更替原因上有所簡化，強調君主失德輕信讒言的教訓；對趙軍戰敗及坑殺降兵則詳加描寫，以凸顯戰爭慘烈。相比之下，司馬光對其他戰國大戰如鄢郢之戰則輕描淡寫，顯示他更注重長平之戰的歷史警示意義，而非單純軍事事件的記錄。

五、從權謀到道德：司馬光對縱橫家評價

司馬光對不同的歷史人物也擁有著不同的評價，筆者發現對於張儀的評價，可由觀察其描寫蘇秦操縱張儀之手段、說明連橫方法有失尊嚴、敘述張儀受辱入秦等三個方向做切入，第一，間接批判在敘述張儀被蘇秦操縱，顯示張儀「智術不足」，《資治通鑑》中寫道：

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²²

²⁰ [漢] 司馬遷，《史記》，頁 2335。

²¹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79。

²²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37。

其中「非君莫能得秦柄」說明蘇秦利用張儀的權力欲望，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反映司馬光出認為張儀本質上是為個人利益服務，而非秉持道義。而「術中而不悟」顯示司馬光藉張儀之口，承認其智謀不如蘇秦，暗示張儀雖善辯詐，卻仍落入他人圈套，筆者認為司馬光藉此暗諷張儀僅有「術」無「德」有所侷限。

第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透過對比批判合縱與連橫兩種策略，說明張儀推行的連橫政策，助長了秦國的強勢，削弱了諸侯的自主，這種局面不僅破壞了原有的權力平衡與秩序，也違背了「以義立國」的原則。在《資治通鑑》中記載蘇秦對韓宣惠王所述：「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²³ 這句話直指韓王甘心臣服於秦國，失去了國家的尊嚴。蘇秦藉此強調合縱抗秦是維護諸侯尊嚴和正義的行為，將合縱策略塑造成符合儒家「義高於利」的道德選擇。相較之下，司馬光透過敘事暗示張儀的連橫策略則是以利誘分化諸侯，促使諸侯屈服於秦，喪失自主，背離了「以義立國」的原則。司馬光利用「牛後」這一比喻，形象地批判連橫使諸侯如牛尾般被牽制，凸顯其妥協求利、見利忘義的本質。這種對比不僅反映了司馬光基於儒家義利觀的價值判斷，也呼應了宋代儒學強調道德治國的思想脈絡，彰顯了他對縱橫家權謀亂政的否定態度。

第三，直接批判說明張儀「無信無義」的縱橫家本質，張儀入秦本非其自願，中間歷經波折，《資治通鑑》是這樣說的：「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恐，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²⁴ 司馬光透過這段敘述，揭示張儀入秦並非出於天下大義，而是因個人受辱而懷有私憤，這種動機違背了儒家

²³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37。

²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37。

士人應有的道德操守。筆者認為，司馬光有意忽略張儀入秦後的政治成就，亦忽略了戰國時代縱橫家所處的動盪背景，僅專注於其私憤動機與欺詐手段，凸顯司馬光在意的是儒家的信義與道德標準。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張儀的負面評價，體現其以儒家道德為核心的史學視角。透過「術中而不悟」的權謀操弄、「牛後之喻」的義利對比，及「困楚入秦」的私憤動機，可側面看出司馬光將縱橫家形塑為「重術輕德」的負面典型。

六、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戰國時期歷史的書寫視角，將其與《史記》進行比較，從司馬光的個人思想、其對事件敘述與人物評價三個層面，分析司馬光如何透露自身的儒家思想傾向與政治理念。並從司馬光對史料的選擇與敘述方式，探討他對歷史事件的政治立場與價值判斷。

首先，《資治通鑑》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時間上涵蓋戰國至五代，²⁵ 司馬光身為北宋保守派的重要政治人物，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其編纂動機不僅是重述歷史，更帶有政治教化與治國借鑒的目的。這使得他在書寫戰國史時，往往以儒家思想與角度作為評判標準，強調德治與誠信的重要，並對法家嚴刑峻法持批判態度。

在個人思想層面，司馬光對「信」的重視貫穿於其史學觀點中。以商鞅變法為例，他肯定建立法律公信力的重要性，但同時批判商鞅法家的嚴酷與冷酷，透過誇張的描寫強調其苛刻無情，暗示這種治國方式缺乏仁德與人情。由此可見，司馬光不僅是記錄史實，更藉由敘述展現儒家治國理念，反對單靠嚴刑峻法的治

²⁵ 夏長樸，〈司馬光疑孟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9期（1997年6月），頁125。

理手段。

在事件敘述方面，司馬光對長平之戰的記錄尤為詳盡，並著重於戰爭的慘烈與道德教訓。他將趙王更換將領的決策簡化為君主輕信讒言的結果，強調君主應明辨是非、以德治國的重要性。對於秦軍坑殺趙軍降兵的殘酷行徑，他詳加描述，藉此警醒後人戰爭的殘酷與人性悲劇。相比之下，他對其他戰役如鄢郢之戰則輕描淡寫，顯示其敘事重點不僅在軍事勝負，更在於歷史事件所蘊含的道德警示與政治教訓。

在人物評價層面，司馬光對縱橫家張儀持明顯負面態度。他透過描述張儀權謀多於德行，並強調其入秦出於私憤而非天下大義，批判其無信無義的本質。同時，他以比喻形象地指出張儀連橫策略助秦分化諸侯，背離儒家「義高於利」的價值觀。這些評價反映司馬光以儒家道德為核心的史學取向，對權謀政治持批判態度，並藉史書傳達治國理想與道德規範。

總而言之，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時以儒家思想與角度為核心，結合史實記錄與道德評價，展現其獨特的敘事視角。透過對戰國史事的選材與評述，司馬光不僅反映了個人思想立場，也透露出北宋保守派的政治理念。

七、參考資料

1.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啟業書局，1977 年。
2.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4 年。
3. 〔元〕脫脫，《宋史》，台北：台灣商務，1981 年。
4. 〔清〕蔡世遠，《古文雅正 十四卷》，台北：台灣商務，1983 年。

5. 李敏、張慧，〈北宋名臣司馬光的治國思想與《資治通鑑》〉，《蘭台世界》，2013年第9期，2013年3月，頁7-8。
6. 李樂，〈司馬光的編輯思想〉，《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2009年1月），頁134-140。
7. 李之勤，〈評《資治通鑑》關於商鞅變法的論述〉，《人文雜誌》1980年第1期，1980年1月，頁62-65。
8. 吳秀琴，《司馬光史論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9. 林俞學，《春秋戰國時代秦國重要人物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10. 施寬文，《《資治通鑑》資鑑法戒的敘事藝術》，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年。
11. 郭創任，〈《史記》與《資治通鑑》中的歷史敘事手法及其影響〉，《課外語文》2023年第7期（2023年7月），頁35-36。
12. 夏長樸，〈司馬光疑孟及其相關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9期，1997年6月，頁115-144。
13. 曹家齊，〈從推尊漢唐到超邁漢唐——司馬光的「三代」漢唐史論及其現實關照〉，《新亞學報》2023年第40卷第2期，2023年12月，頁59-84。
14. 黃錦鉉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白話資治通鑑執行編譯教授，《白話資治通鑑 294卷》，台北：文化出版社，1984年。
15. 雷家宏，〈略談《資治通鑑》對變法革新的史事述評〉，《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1989年4月，頁104-110。